

中岛敦《狼疾记》中的儒与道

孙树林

《狼疾记》（注1）是中岛敦的前期代表作，被认为是最能代表其文学特质的小说之一。作者在《狼疾记》标题下引用了《孟子》的“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作为该小说的题记。“狼疾”一词被认为是破译《狼疾记》的关键。那么，何为“狼疾”？中岛敦对其进行了怎样的诠释？使其赋予了怎样的内涵？

战后，开中岛敦文学评介之先河的是武田泰淳，他在《作家之狼疾——读中岛敦〈我的西游记〉》（注2）中评道：“这是非他而无人能写得出的新文学。”“是中岛敦使用了‘狼疾’一词，而不是别人，中岛敦使用该词的意义是深刻的。所谓狼疾，系孟子语，称‘因只顾及一指而失去肩背却不知者为狼疾之人。’这里的一指即中岛本人，是拘泥于自我的文学状况；这里的肩背该是作为生活体的中岛的全部存在，以及自身以外的文学，具有悟空之自由和三藏之宏大的文学。”这一论断不仅给中岛敦及其文学予以了定位和定性，同时也给后来的“狼疾”论定了基调（注3）。其后，奥野政元也论及“狼疾”：“狼疾意为只顾及一指而失去全身。所谓一指，被释为怀疑、存在之不安等等；虽然‘何为自我？’‘世界为何如此？’等疑问常被引用，但应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发出此类疑问的自尊心之反驳。（注4）”此外，专事于中岛敦研究的佐佐木充也认为：中岛敦是作为“三造（以往的传吉）的本质象征”而“采用‘狼疾’一词”的，“三造的‘一指’就是‘存在的不确切’”（注5）。

上述诸论基本上涵盖了中岛敦研究的三个阶段，被认为是关于《狼疾记》主题论中最具权威性的论述。然而，这些论述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区别，但由于都是在一个层面上探讨问题，故实质上是大同小异。一言以蔽之：都是站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基点上，用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去探讨《狼疾记》中现代人的“焦躁与倦怠”及“青春的忧郁”，因此，“一指”和“肩背”也只能解释为西方哲学概念中的“小我”和“外部存在”了。

生存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中岛敦，不仅具有丰富的现代西方文化知识，同时也具备着渊博的汉学修养；并且，汉学不仅仅是他文化修养构成的一部分，业已溶入其精神观念之中，成为构筑他宇宙观之基础之一。《狼疾记》中，东方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是交叉并存的（注6），其表现为表与里、阴与阳的对立统一，因而在作品中便形成了一个混沌的不甚和谐的二元世界。然而，在迄今为止的《狼疾记》评论中，由于皆以西方哲学思想去检测，从而抛弃了掩藏于作品深层的东方哲学思想的内核。哲学·思想·文化等对于人的观念及行为的影响具有跳跃式的不连续性、潜在性和隐蔽性，因此，对于一个成长在儒学世家、深受汉学思想影响的中岛敦来说，在研究其作品时，如果仅仅从表面现象判断其与东方文化无缘从而放弃对其探究的话，应该说这一判断是有失偏颇的，是不周延的。

《狼疾记》由五章构成，作者以片段式的情节拼凑和以形而上学式的哲学思考描绘了作为女子学校教师的主人公三造那百无聊赖的生活，尤其是用重彩渲染了他沉郁的精神世界。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来看，与其说是描绘与勾勒，到不如说是以文学形式将其如实地记录更为确切。《狼疾记》中的主人公由于时常处于精神的不安和自责的羁绊之中，因此便试图通过以形而上学式的哲学思辩来觅得走出困境的出口。

《狼疾记》主人公时常感到自己“存在的不确定性”，这是他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其滥觞可追溯到他小学四年级。当时，不怀好意的教师对年幼的学生们反复地讲述宇宙、太阳以及人类毁灭的故事，从而在幼小的三造心灵深处埋下了“存在的不确定性”意识的种子。对三造来说，“地球冷却和人类灭绝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可是据说随后连太阳也将消失。太阳冷却，光焰消失，在黑洞洞的空间中，只有无人能看得到的漆黑而冰冷的星球在不停地旋转着。一想到此情景，他立刻感到坐立不安。”于是，他在思考：这样一来，自己生在人世，人类以及宇宙的存在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了吗？他不解地自问“自己究竟为何生在这个世上？”于是，十一岁的他一时间患了神经衰弱。进入中学时代，他依旧时常感到“存在的不安”，他发现：将文字按笔划分解后会失去该字的必然性，并由这种感觉而又诱发出对周围事物存在的不确定感：“三造每遇到一件事情便会增加对周围一切的不信任感。自己周围的一切竟是如此地缺乏必然性。世界是偶然的假象的集结！”这些，便是三造“存在的不安”意识的历史。

作者在小说中是这样描述主人公现在的状态的：“银幕上正在上映记录南洋土著居民生活的影片”，“看着看着，三造内心又泛起了那种忘怀已久的某种奇妙的不安”，“感到了命运的不确定性”，“存在的虚无”，“周围的丑恶”，“自我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反省自我和刻薄的自责。

从上述的表象来看，《狼疾记》似乎的确是在描述现代人“自我的丧失”和“存在的不安”。然而，问题并非仅限于此。下面，切入问题的实质。

三造看到银幕上南洋土著人的生活写实，从而唤起了自己潜在的不安。他想：“说不定自己也会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出生呢。”“在热带炎炎的烈日下，不知道唯物论，不知道维摩居士，不知道定言命题，甚至不知道人类历史，不知道太阳系的结构，一无所知地终结一生。”“在远古地球的冰河时期，南美洲的骆马在遭遇灾难时，曾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即便是今天，一遇到危险，骆马们依旧会朝它们祖先的避难所逃去。”因此，作者推论道：“三造的不安或许也是此类前世的残存物。这种无可名状的漠然的不安往往成为他生活的主低调音，这一无形的暗流在其人生一应事项的底部流淌，在生存的前后左右区划着……”

这一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读白与作者的正面阐释，就大大地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所界定的自我“存在的不安”的范围。作者进一步推论：

“自己不是也有作为与当今人类不同的更高级的生命（也许是生存在其它行星上，也许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生命，也许是出现在不同时期人类灭绝后的地球上。）而转生来的可能性吗？由

于搞不清楚，我们便怀着恐怖的情感称之为偶然，如果稍稍改变一下其运行方式，有谁敢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并且，假若自己托生成那样存在方式的生命的的话，那么就一定会看到现在自己看不到的事情，听到现在自己听不到的东西，思考现在自己不能思考的问题的。”这种思考，对他来说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焦虑。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存在着自己看不到、听不到、想不到的事情（不是出于经验而是为能力所限），正因为自己是现在的存在形态，因此才想象不出不同于现在自己存在的事情的。

中岛敦的这一关于生命存在形态的思考，即不是对于位于社会之中的个体生命的自我考察，也不是对现代式存在不安的反思，而是对“现存在”以前的“原始存在”（注7）的探究，这才是使他躁动而感到“存在的不安”的真正原因。勿庸置言，中岛敦的这一推论是与进化论和实证科学等现代科学及哲学理论相抵牾的，对于成长于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岛敦来说，如此的理论思考是违背时代潮流的，被认为是唯心的。然而，在小说中可以明确地看到：他的思考态度却又是如此地严肃认真而且颇具理性。因此，没有理由对此置之不理或是不屑一顾，而是应该认真地探讨一下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始动因及其真正的来源。

二

在日本，有两个“中岛敦文库”，一个是在神奈川县立近代文学馆，以收藏作者手稿等资料为主；另一处是在日本大学法学部图书馆，以收藏作者藏书为主。在日本大学法学部的“中岛敦文库”的3793册藏书中，有关佛教方面的书籍仅有4册，而余下的绝大部分为汉学类，其中儒家和道家方面的著作占有相当数量。在有关《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著作中有的留有读书笔记。当然，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些读书笔记都是中岛敦做的（注8）；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关研究表明，中岛敦从执笔《狼疾记》的前一年（1935）开始，便潜心研读《列子》《庄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著作和王维、高青邱等的诗文（注9）；并且，这一时期研读的汉籍作为素材与其后的创作存在着诸多的因缘关系。本文不再进一步考究作品与素材的使用关系，仅就迄今尚未被论及的一些思想影响问题做些许探究。

在《列子》中，有许多诸如“化人”引导周穆王神游的神·道·仙的故事；在《庄子》中，生命的存在并非仅仅是“生”“死”的两极分化，而是多元化的，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动态过程。例如：“庄周化蝶”的譬喻；“万物皆化”的生命流转方式；“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的对生命流转方式的哲学解释等等便是其生命观的具体体现。这些思想不仅在宏观上长期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也同时在影响着汉文化圈中的各个民族。所以，对成长在儒学世家的中岛敦来说，就不只是影响的可能性问题，而是影响的广度与深度的问题。基于以上情况，可以推测：中岛敦的关于生命的思考方式似乎是近似于佛家的轮回转世说，但从实际情况来考察，应该是更多地受了《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著作的影响的。

如前所述，三造感到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自己周围的一切竟是如此地缺乏必然性。世界是偶然的假象的集结！”这种虚无观产生的原始成因，在作品中归结为小学四年级时反复被教师灌输了有

关人类与宇宙毁灭的恐怖话题的缘故，以及在其后的人生中对世界的观察和感受。三造的这种“存在的不确定”性感受或曰观念，应该说是基于对生命存在的“偶然性”的一种悲观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从《列子》中似乎可以窥见到其雏形。

《列子·力命篇》中，关于生命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有如下的论述：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中略）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生死天定”论，肯定“命”的“必然性”，但同时，“命”对于一般人来说又是不可知的，是“无奈何”的。故此，这里的“命”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也就成为“绝对偶然”的了。

再看《列子·力命篇》的另一段。

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

这一段是假借“力”与“命”的问答，来阐述列子的宿命论及对此所持的态度。这里的“力”可解释为人的意愿及行为，“命”可解释为超越人类自身的天定。“命”反驳了“力”之可按照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一切都是人为的结果的谬论，提出“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的宿命论命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言及的“命”并非是在操控事物，而是业已存在于各个事物之中，按照自动的机制在发挥其作用，并暗示天命存在的绝对性和其不可知性。

从上述两段中不难看出，在“命”的问题上，“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相生相克的一体关系，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构成。

在《狼疾记》中我们看到：中岛敦的关于“存在的不确定性”、“缺乏必然性”、“世界是偶然的假象的集结”等感受（观念）的描述，和《列子》的“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存在着神似的想象关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子》和《庄子》关于生命的论述是超然的，一般被认为不具备《列子》的这种“宿命色彩”。因此，可以推测：《列子》的这种“宿命”思想很可能是中岛敦《狼疾记》三造上述思想形成的渊源之一。

中岛敦在受到《列子》“偶然性”因素影响的同时，似乎没有被其“必然性”部分所震撼。换言之，中岛敦似乎忽视了道家学说中对生命存在的智慧的解释和超然态度。这般思想影响状态的形成，自然与作者自身状况有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小说主人公那里得到答案。三造小时就试图使自己处于两种状态：一是“自己变成神”，能知晓世上万事万物；二是“相信这个世界是绝对值得信赖的”，即绝对相信现实的一切，不再去探究什么生命是否会永生的问题。在《狼疾记》中，我们注意到：成人后三造的表现形态是始终在竭力地探求生命最终是否会毁灭这一关涉自身的具体问题。换言之，《列子》讲

的是具有多元性的道，而中岛追求的只是“我们的灵魂到底是不灭呢？还是和肉体一道灭亡？”这一实用主义式的单一的理。

由于中岛敦在创作该小说之前对生命存在问题持有明确的功利性，因而他只注重了《列子》中生命“偶然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必然性”的另一面。故此，体现在三造那里，便是得不到关于人生死问题的最终答案，被置于精神上的困苦境地中，发出“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声声叹息。但是，道家的关于生死轮回的有关论述对中岛敦又存在着极大的诱惑与启示，因为这不仅使他由来已久的对生命的探索可以得到理论的支持，更从中看到了其操作的可行性。关于道家思想对中岛敦文学的影响问题，不仅从上述有关《狼疾记》的材料中可以得到佐证，更为其后来的作品所验证，在此不一一赘述。

三

中岛敦的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二元世界，体现在人物身上便是内在精神世界的矛盾纠葛。这种在同一个身体中存在着两个相互排斥的心理倾向可称之为“一身二我”（注10）。例如：《斗南先生》中主人公三造对伯父的矛盾心理；《变色龙日记》中主人公与其体内的“操纵者”的共存；《山月记》中李征人与虎的二位一体；《李陵》中人物内心中的矛盾状态；《弟子》中子路的对儒学的同化与异化等等诸多表象。在《狼疾记》中，作者是这样描述“一身二我”的：

在三造身体里的另一个人，即贫乏的常识家在耻笑和警示他这种荒诞的非常识性（指对生命真谛的探索，笔者注），他嘲笑道：“笑谈！这么年轻轻的竟思考那等无聊的事情。眼下，不是有许多更重大的更直接的问题需要思考的吗？可你竟然沉醉于那等非现实的·不足取的·奢侈的愚蠢之中！那等事情，是早就被人们搞清楚的了。”

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这个存在于三造体内的另一个自我已不再满足通过主人公的潜意识来传达自己的意愿，而是跳到表面上来指手画脚，斥责三造是“超越世俗的清高”，是“孤芳自赏”，批判他的精神追求，干预他的“非现实”行为。

三造之所以被另一个自我指责，其表面似乎是由于他对“宿命”“生死”等非现实事物的关心和他虚无遁世的人生态度，但其实质的原因是他对“超自然”和“神”存在的关注与倾心，对自己永生不死的渴求。如前所述，中岛敦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影响大多应该是来源于道家学说，换言之，三造的这种尚处于混沌状态的对解脱生死的探究应该是作者内在的道家学说的一种自然外化。那么，这个阻止他的这种探索的存在于自身的另一个自我的思想根源又是来自哪里呢？

孔子是这样教育他的弟子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篇》）“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篇》）孔子在此指出的“多闻”“多见”自然是指根置于现实社会的踏踏实实的实践，这是被称为现实主义者的孔子的一贯主张。《狼疾记》中的另一个自我为了使三造抛弃其追求而关注现实人生，又进一步教训道：“世界不是依靠你所用的概念就能变大、变深、变

美的。相反，深入观察其细微之处，并通过积极地对其起作用才能使世界无限地扩大。（中略）要在现实社会中去发现最为优秀的智慧，人生的现实看上去没有任何出奇之处，但对其进行加工，依照一定的方式去处理的话，有时即刻会成为有意义且有趣的事情。”无庸赘述，这一口吻和观点与孔子上述的说教具有微妙的相似性。

众所周知，从孔子起，儒家始终注重现实和现世，人生以遵循“仁、义、礼、智、信”和修得“六艺”为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大理想，志于成为为国有用的正人君子。孔子在《论语》中主张“志士仁人”，“以道事君”“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日本明治末年的学者纲岛荣一郎（号梁川）在其著作《春秋伦理思想史》（注11）中对孔子是这样评价的：“孔子关心的不是耶稣式的宗教，不是释迦式的思索悟道，不是老庄式的虚无恬憺，而是苏格拉底式的一味地关注现实社会中的人事及道德。”这段论述，可以说言简意赅地划清了儒、释、道的界限，更是点到了儒家思想的实质。

孔子虽然主张积极入世，倡导关注现实人生，但是他也是信“天命”，通“易学”，知“鬼神”的。然而，当弟子问及此类问题时，他为了使弟子能专注现世人生却回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因此，《论语》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

上述存在于三造体内的另一个自我这样训斥道：“人是被创造成只能在时间、空间、数字等观念之内才能思考事情的，因此，对于超过这种形式的任何事情都是无法理解的。象什么神呀，超自然呀等这些存在（抑或不存在）在理论上之所以证明不出来，其原因就在于此。”这另一个自我的训斥业已证明：他也是承认人是由“更高的存在”创造出来的，他应该是知晓这些的；然而，他对此却三缄其口，而一味地让三造关注现实人生。这段话虽然在表述上不是在重复孔子的原话，但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却同出一门，是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下例事例为证。

中岛敦在创作《弟子》时，曾查阅和整理了大量的关于孔子及其弟子尤其是有关子路的生平事迹和言论等史料（注12），其中在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的《袖珍论语》中作者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其中，关于上述一段的笔记如下：

○○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从这些记号中，可以辨认出：第一个圈是铅笔，第二个是黑钢笔；字右边（因为是竖版）的波浪线是铅笔。依此，可以断定：中岛敦最少是先后两次阅读了该部分，并且，至少两次对这一部分产生了浓厚兴趣。还有，作者第二个圆用了重笔将内圈涂黑，这在中岛敦的读书笔记中是很稀有的现象，这就证明了中岛敦对这断论述是颇为重视的。但是，应该说明的是，虽然这一读书笔记被认为是在作者创作《狼疾记》之后做的，与其不一定有着必然的联系，但重要的是《狼疾记》却直接引用了该语。因此，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中岛敦对孔子的这一断论述是何等重视，同时也反证了中岛敦对孔子的这一论点的留意是有着相当的历史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其后的《弟子》中，孔子的这一主张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

挥。

孔子告诫弟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在《狼疾记》中，另一个自我要他不要想入非非，不要追求超越现实的东西。因此，主人公三造便“憎恶说教‘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人”，并愤怒地呐喊：“应该是‘未知死，何谈生’！”自不殒言，在这里，被憎恨的必定是孔子或孔子式的妨碍他探究人生问题之人，反驳的自然是他只关注现实人生的论理。通过上面的考察，潜在于三造体内的另一个自我业已显现出其本来面目：这个被其称之为“贫乏的常识家”的另一个自我不是别人，应该是潜在于三造精神深处的儒家思想。

四

《狼疾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想象着自己临终时的心情，在想象那一瞬间反观自己的一生而感到时日之短暂（无论是二十年也好还是二百年也好都是一样的）时的感受。（略）自己也和世俗之人一样，在那一瞬间到来之前，在忘我地奔波，根本就不悟处于大环境中的自己的位置，忙忙碌碌地为俗事而烦心。（略）然而，到了最后的那一瞬间才大梦方醒……

这段描述中有一个值得考察的词，即“在那一瞬间到来之前，在忘我地奔波，根本就不悟处于大环境中的自己的位置”一句中的“大环境”一词。从前后文来看，这里用的“大环境”一词的指代很不明确，不知所云。如果不从作品的宏观去审视，不从东方文化思想的视角去探究的话，是很难解其真意的。而这一问题又与本文篇首提及的《孟子》语录中的“一指”“肩背”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先来考察上述的《孟子》语录。《狼疾记》题记所引的这段孟子语录，是《孟子·告子章句上》一节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孟子首先提出了“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接着，孟子又指出：“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所以，“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狼疾”一词，朱子解为“患狼疾病之人”，即：狼本来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头的，但是一旦患上此病，便不能回首，故被喻为“失去肩背”；赵歧将其解释为“医生”，是指只顾治疗一指而不顾肩背之疾患的庸医。从《孟子》所言的旨意来看，似乎后者解得较为贴切。

孟子是在借身体各个部分的关系来阐述“大”与“小”的辩证关系，因此，这里所谓的“大”与“小”就不仅仅是局限于身体，可抽象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精神”与“肉体”，“理想”与“现实”，“高尚”与“庸俗”，“永远”与“暂时”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孟子是假借人体来譬物和言理，指明要抓主要矛盾，不能因小而失大，要“养其大”而成为“大人”。孟子在《孟子·告子章句上》中提倡“先立乎其大”，其立意即在于此。因此，熟读《孟子》的中岛敦是不会理解不到孟子所言的深邃寓意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岛敦正是在深刻地理解了上述含义的基础上而引用此句的。

孟子的哲学内容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注13）：“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居仁行义”的修养方法；“内圣外王”的王道政治论。其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被认为是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居仁行义”和“内圣外王”是由“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演化而来，是依靠“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来支持的。所谓“天人合一”，简言之，就是将“人道”和于“天道”。“天道”在中国哲学中一般是指“天运行演化之规律”，因此，万物的诞生，存在，变化，衰败，灭亡等等均依照此规律而不可逆行。“人道”自然是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及其人类社会应遵循的规则。在孟子看来，既然“天道”大于和高于“人道”，人就必须合于“天道”，并发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训告。

在《狼疾记》中，所谓“小”，应该是造成三造目前“存在的不确定”并企图摆脱的一切因素的总和。那么，“大”即中岛敦所谓的“大环境”又是指什么呢？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生存圈，小则如自己的身心，家庭，工作；大则如社会，世界，时代等等。在《狼疾记》的姊妹篇《变色龙日记》中，作者将“组织，习惯，秩序”称为“大”，这似乎不失为一种解释，但是“组织，习惯，秩序”毕竟只是社会存在形态的一种体现，并没有超越现实社会，而我们在《狼疾记》中看到，三造的思考圈不只局限于人类社会，而是扩展到“与当今人类不同的更高级的生命”、“生存在其它行星上”的生命、“肉眼看不见的生命”、生存在“不同时期人类灭绝后的地球上”的生命等更大的时空中。这些，可谓是中岛敦在小说中展示的“大”，也应该成为对“大环境”一词的诠释。也就是说，中岛敦的“大环境”包涵着生命、物质、时空存在的多元性与连续性。

众所周知，关于“大”的概念，释迦牟尼有“三千大千世界”之说，这可谓佛学对宇宙的“大”之解释；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论及“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儒家只着眼于人世中的伦理道德，故没有佛道那般开阔的视野。因此，包括中岛敦在内的东方文化圈的人们观念中的“大”往往都没有超越上述佛道学说中的“大”范围。诚然，中岛敦的“大环境”的时空观的背后应该是得到上述理论的影响和支持的。

三造所思考的是“与当今人类不同的更高级的生命存在（也许是生存在其它行星上，也许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生命，也许是出现在不同时期人类灭绝后的地球上。）”问题，这一思维行为本身，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从其逻辑推理的科学性上来看，都是超越了当今人类社会的普遍性的。也就是说，中岛敦是在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的基础之上，是在佛道学说的“大”的思考圈内来认识“大”的，因此，他才将其称之为“大环境”。他是在东方文化的“大环境”中，从空间的横向和时间的纵向来探索人的存在形态及生命的存续等问题的。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进行如下的判断：其一，中岛敦之所以引用孟子的这段论述，该是因为他在探究生命存在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时而意外地遇到了孟子之句，是因为他在该句中发现了可为我引申的寓意的缘故。故此，作者在应用此句时，大胆地扬弃了儒家一味地关注现实人生的“贫乏的常识家”式的论理，予以其全新而独特的诠释，使孟子的“大”与“小”的内涵与外延扩展到佛道的“大环境”（大

境界)中。中岛敦引用“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的寓意在于：如果一味地执着眼前现世的“小”之“一指”，就会失去向永恒的“大环境”中升华的“肩背”。其二，如果只着眼于主人公精神世界的表象，站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基点上，尤其是站在存在主义的视角来探究《狼疾记》的话，也只能看到该作品的主题是“存在的不安”；但如果能撩开这层形而上学的迷雾，进入到中岛敦精神世界深层的话，便会看到其东方哲学思想的光芒。并且，我们还会发现：在中岛敦的文学中，西方文化思想大多仅仅为表层上之一种装饰，而潜在于作品深层的东方哲学思想才真正是制约其文学本质的关键所在。其三，在《狼疾记》结构中，不只是表面的西方思想与深层的东方思想并存这一单一构造，在深层，又存在着儒与道思想哲学分庭抗礼的一个独立的东方文化体系。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一身二我”现象便是这一双重结构内蕴涵的矛盾的直接而真实的艺术再现。“一身二我”的矛盾冲突，在表象上是现代宇宙观与传统宇宙观的对立，是人本能的求生欲望与现实存在的抵忤，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在中岛敦精神世界中的不兼容性而造成的。因此，在《狼疾记》中，作者正尝试着摆脱儒家观念的束缚并借助道家的智慧去探索人生真谛。

注：

- (1) 《狼疾记》于1936年11月10日托稿，但直到六年后，中岛敦才将其与《变色龙日记》一道冠以《过去帐》的总题而编入他的第二个创作集《南岛谭》(1942年11月15日，今日问题社)中发表。
- (2) 武田泰淳《作家的狼疾——读中岛敦〈我的西游记〉》(1948年2月，《中国文学》第103号)。
- (3) 竹胜天雄等编《新现代文学研究必携》(1993年2月，学灯社)。
- (4) 奥野政元《中岛敦论考》(1989年4月，樱枫社)。
- (5) 佐佐木充《中岛敦的文学》(1973年6月，樱枫社)。
- (6) 由于本小说充斥着浓郁的形而上学气氛，且多处提及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有关内容，因此一般被认为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避开西方文化影响的一面，只就东方文化影响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 (7) 中岛敦的这段话涉及到了“临死体验”和“史前文明”问题。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业已成为医学和文明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是，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岛敦生活的十九世纪上叶此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处于史料的收集和介绍阶段。目前，由于尚未发现能证明中岛敦曾经阅读过此方面文献的有关史料，因此，还无法搞清中岛敦究竟是从何种资料中获得此方面的知识的，这些有待于日后进一步考究。
- (8) 在日本大学法学部的“中岛敦文库”的3793册中岛家藏书中，不全为中岛敦的旧藏，也有其伯父中岛竦和其父中岛田人的藏书，其读书笔记亦然；并且，有一部分是从古旧书店购入的，因此，读书笔记的情况较为复杂，只能从笔迹去辨别。
- (9) 见《中岛敦年谱》(《中岛敦全集第三卷》1976年9月，筑摩书房)。
- (10) 这是笔者的命名，是中岛敦观念和文学的二元性的表象之一。其详细情况将在其它文章中探讨。
- (11) 贝塚茂树《诸子百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1961年12月，岩波书店)。
- (12) 村上秀明《中岛敦的〈弟子〉创造》(2002年10日，明治书院)。
- (13) 焦国成等《儒门亚圣孟子》(1996年6月，中国华侨出版社)。

附：本文系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小稿得到久保田启一教授的热忱指导和佐藤利行教授的特别垂爱，在此一并鸣谢。

(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 广岛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外国人客座研究员)